

积极错觉:基于进化论和社会互动的视角

陈洪岩^{1,2}, 谭顶良^{3*}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 210097; 2. 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新乡 453003;
3.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摘要:积极错觉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于维持个体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从进化论和社会互动论的视角对积极错觉进行阐述。从进化论的视角看,积极错觉有助于身心健康和认知适应;从社会互动论视角看,积极错觉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化积极错觉的跨文化研究,重视对特殊群体积极错觉的研究,并加强积极错觉的应用研究和脑机制研究。

关键词:积极错觉;进化论;社会互动论;跨文化;特殊群体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9)02-0114-06

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最早出现在心理健康的研究领域之中。早期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社会认知加工是对事物客观、准确的反应,是以公正的、符合逻辑的方式进行的加工处理(Kahneman & Tversky, 1973)。因而许多理论都认为对自我、世界和未来的正确认知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所以,一直以来乐观主义都被视为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作为乐观主义表现形式的积极错觉也一直被人们忽视(Carr, 2004)。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人类的认知加工实际上充满了不完整、错误和偏见。其信息加工机制在对信息进行加工时会有意识地将它们朝积极的方向纠正,当个体接受到消极反馈信息或者自我价值感受到威胁时,这种对现实的歪曲就会发挥其积极作用,进而增强个体的适应能力,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Makridakis & Moleskis, 2015; Young, 2014)。为此,人们开始重视对积极错觉的相关研究。

积极错觉的概念最早由Taylor 和 Brown于1988年首次提出,他们认为积极错觉是个体对自己和外界世界积极的歪曲事实的知觉方式,是个体在生活中或面对危险性情境和压力性事件时作出的对自我、现实生活和未来的一种认知过滤和积极的心理适应(Taylor & Brown, 1988)。这些认知过滤和积极的心理适应有助于保护自尊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1 积极错觉的表现形式

1.1 不切实际的积极自我夸大(unrealistically positive view of self)

不切实际的积极自我夸大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品质和行为表现等方面给予的不切实际的积极评估(Carr, 2004)。Brown 和 Taylor(1986)的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指出描述自己的这些积极和消极人格词是否正确时,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积极的人格词。Alicke(1985)的研究发现,积极的自我人格特质更容易被回忆和加工。另外,Campbell(1986)的研究指出,人们会弱化他们的缺点而夸大其优势,并且对他们擅长的事情往往赋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贬低他们不擅长的事情的重要性(Lewicki, 1984)。研究显示,大部分个体对自己都持积极的观点,即他们在认识自我时会表现出一种优于大多数(better-than-most)的效应(Taylor & Brown, 1994)。

1.2 夸大对现实的控制感(exaggerated sense of control of reality)

夸大对现实的控制感指的是个体会高估对自我以外的现实事件的控制能力,这种高估一般发生在个体对现实事件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的基础上。美国心理学家Langer等(1975)的研究发现,在一系列的赌博任务中,人们常常表现得他们已经掌握了局势,但实际上这种局面完全由运气决定。

* 通讯作者:谭顶良,E-mail:02088@njnu.edu.cn。

在对癌症病人、艾滋病患者的研究发现,与控制感低的病人相比,那些对疾病有着较高控制感的病人更能积极地应对疾病。相反,那些觉得对当前处境乃至整个生命都失去了控制的患者会产生心理上的挫败感,甚至导致身心崩溃(Taylor, Kemeny, Reed, Bower, & Gruenewald, 2000)。

1.3 对未来的盲目乐观(unrealistic optimism)

对未来的盲目乐观指的是个体对未来毫无根据的乐观,并认定未来会发生更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Taylor & Brown, 1988)。Brickman, Coates 和 Janoff-bulman(1978)的研究发现,大部分人都认为现在比过去好,而未来则比现在更好。另外,人们往往会认为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有更大的可能性遇到令人高兴的事情,比如获得满意的工作、拥有聪明的孩子以及可观的薪水等;而当问及一些负性生活事件时,比如遭遇车祸、成为罪犯或者患上疾病,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去经历这些事情(Perloff & Fetzer, 1986)。有研究指出,个体乐观水平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乐观是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变量(张文晋,郭菲,陈祉妍,2011)。并且,乐观有助于提升个体包括心理韧性在内的心理社会资源水平,进而降低抑郁水平(牛更枫,范翠英,周宗奎,田媛,连帅磊,2015)。

研究发现,英国监狱服刑人员对其刑满释放后是否会再次犯罪存在盲目乐观,即他们自己的预期比官方统计的再次犯罪要乐观很多。另外,他们还有一种自我提升的倾向,即认为他们自己比其他服刑人员有更小的再次犯罪的可能性。(Dhami, Mandel, Loewenstein, & Ayton, 2006)

2 进化论视角下积极错觉的研究

Tiger 在《乐观主义》一书中指出,人类是运用乐观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未来的,这种能力是物种进化后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些对现实和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个体是没有动力去战胜危险、疾病和死亡等生存中所面临的问题的。相反,乐观的人就有动力去战胜这些困难。因而,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作为乐观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积极错觉是具有鲜明的适应性特点的。我们大多数人身上都存在积极错觉,而且积极的自我错觉在生命的早期就开始了,它已经成为我们物种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一种性格(吕丽霞,2006)。

2.1 积极错觉有助于身体健康

一些研究发现,积极错觉作为一种积极的知觉

方式对于延缓病情恶化、延长寿命、维持身体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积极错觉可以为应对疾病和身体恢复提供足够的心理资源。Taylor 等(2000)对艾滋病患者和癌症病人的研究中发现,那些认为自己能够控制病情发展、对自身疾病有积极错觉的患者,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并自觉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能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进而有助于控制病情和延长生命。Affleck, Tennen, Croog 和 Levine (1987)通过追踪研究的方法对罹患过心脏病的男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这些男性中,那些对患心脏病这一事件持积极观点的人,他们再次患心脏病的机率会降低,而且在接下来的八年中他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较低。另外对乳腺癌病人的研究也发现,积极错觉水平较高的乳腺癌患者,即相信自己不会再度遭受癌症的困扰,能够更好地调试心理并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Taylor et al., 2000)。

2.2 积极错觉有助于心理健康

积极错觉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积极错觉是应对创伤性生活事件的关键因素,对于创伤后心理的复原极为重要。Van 和 Nowak(2011)的研究发现,积极错觉可以明显地降低对压力的生理反应(血压),这种降低通过三个方面来完成,分别是积极的情绪、建设性的行为和社会支持。Mazur, Wolchik, Virdin, Sandler 和 West (1999)以9~12岁离异家庭的孩子为研究对象,发现,积极错觉可以缓解离婚事件对孩子心理上的不良影响,促进儿童对于离婚事件的心理适应。郑美娟(2017)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积极错觉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积极错觉能够让个体自我感觉更为良好,自信心更强,更能积极地应对和解决问题。蒋怀滨、缪晓兰、张斌等(2015)的研究也指出,积极错觉影响自我和谐水平,积极幻想者倾向于对自己未来生活进行理想化想象、能够提高对外部事物的控制水平以及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自我的接纳水平更高。可见,积极错觉可以使个体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来认知自我及外部世界,促使个体在挫折情境下恢复自尊,从而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积极错觉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发展自尊、维持自我效能感和希望感(Vincze, 2011)。

2.3 积极错觉与认知适应

Taylor 通过临床调查发现,许多个体在遭遇重大负性生活事件(身患重病或亲人离去)时都会在主观上做出努力,尽可能地将自己恢复到先前的生

活状态。他由此提出认知适应的概念来解释在极端应激事件和情境中个体的积极心理过程。他指出个体的认知适应是建立在“积极错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积极错觉的心理倾向在对应激事件的心理调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认知适应包括三个过程:探寻事件的意义、重新获得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控制感和通过自我提升重建自尊(Taylor & Brown, 1988)。认知适应过程可以使个体重新积聚和整合自身曾被破坏的心理资源,通过探寻意义使个体达到乐观的态度,通过重建控制感来构建信心,通过自我增强的努力来保护自尊,从而使个体达到身心健康和幸福的状态(陈建文,陈莎,2009)。

3 社会互动论视角下积极错觉的研究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Thibaut 和 Kelley 于 1959 年首次提出了社会互动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际互倚理论。该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在互动中每个成员试图影响对方的行为与结果。美国心理学家 Murray 提出了以人际互倚理论为基础的积极错觉模型,即个体由于自我投射的作用形成了心目中理想对象的印象,然后又把理想对象的特点投射到其现实对象身上,形成积极错觉,这种积极错觉有助于增强双方关系的满意度(Murray, Holmes, & Griffin, 1996)。因而积极错觉在人际交往和互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于维持良好的婚姻关系、恋爱关系和亲子关系等均有促进作用。

3.1 积极错觉与恋爱关系

积极错觉与恋爱关系的研究是心理学家较为关注的一个领域。Murray 等(1996)指出,当人们沉浸在恋爱中时,他们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们会将对方想象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恋爱对象,这种积极错觉有助于增强恋爱满意度。在婚姻关系中,如果夫妻彼此对其另一半有积极错觉,即对另一半的评价更为积极,则婚姻满意度是最高的,其次是夫妻有一方对其伴侣有积极错觉,而夫妻双方对另一半都没有积极错觉的夫妻,婚姻满意度是最低的。Barelds 和 Dijkstra(2009)的研究发现,积极错觉多发生在恋爱初期,并在短期内对女性的恋爱满意度有积极作用。此外,在恋爱中,恋人对其自身和对方身体吸引力的评估上都存在积极错觉,这种积极错觉可以使得相互间的恋爱关系更稳定和持久(Barelds, Dijkstra, Koudenburg, & Swami, 2011)。Leo(2014)的研究也发现,积极错觉可以使恋人双方更能

容忍对方的错误。

3.2 积极错觉与婚姻关系

在婚姻关系中,一方常常会担心自己的另一半并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那个人”,为了在对伴侣的期许和担忧上达到认知上的平衡进而维持自身的安全感,一方会修饰对方的优点和美德,贬低对方的缺点,将理想自我投射到伴侣身上来形成积极错觉。Barelds 和 Dijkstra(2011)的研究也发现,积极错觉可以增进夫妻感情,提高婚姻满意度,并可以延长婚姻维持的时间,增进双方的安全感。另外,身体吸引力也是亲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性。Barelds - Dijkstra 和 Barelds(2008)的研究选取了 93 对婚龄在 14 年以上的异性夫妻,发现夫妻双方对另一方身体吸引力的评估要高于自己对其身体吸引力的评估,而且伴侣的身体吸引力与承诺、激情、亲密和满足呈正相关。

3.3 积极错觉与其他社会关系

Murry 等(1996)认为,积极的投射错觉不仅发生在恋爱和夫妻双方上,同时也可能发生在亲子或者家庭等其他亲密关系上。刘俐娜(2010)的研究发现,初高中生对于父母的印象高于父母的自我印象,他们对父母的评价比父母的自我评价更积极。另外,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评价也比对他人孩子的评价更优秀,并且积极错觉对亲子关系的满意度有积极的预测作用。Wenger 和 Fowers(2008)的研究发现,2~5 岁孩子的父母在对孩子的养育中存在着积极错觉,他们对于孩子的评定更为积极。Boucher(2014)的研究发现,在大学生的友谊中存在着积极错觉的现象,这种积极错觉可以促进友谊的维持和增进友谊满意度。Biggane, Allen 和 Albert(2016)的研究也指出,雇佣关系中也存在积极错觉的现象,这种积极错觉有助于雇佣关系的长期维持并能增强双方的满意度。

4 未来的研究展望

4.1 深化对积极错觉的跨文化研究

积极的自我错觉在生命的早期就开始了,它已经成为我们物种进化过程中保留下的一种性格,那么积极错觉是否带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或差异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Markus 和 Kitayama(1991)的研究指出,积极错觉的程度与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其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与特征。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不仅缺乏积极错觉,而且还普遍存在着消极错觉,即

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有着低自我价值感的倾向。Heine 和 Hamamura(2007)的研究发现,东西方人在积极错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西方人的积极错觉程度显著高于东方人。

Vevea 等(2005)的一项元分析的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积极错觉带有集体主义文化的特征,比如:他们认为自己更具合作性、更受人尊敬、更有礼貌和更具依存性;而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积极错觉则具有个体主义文化的特征,比如他们认为自己更智慧、更具反叛精神、更真实和更为独立。据此,研究者提出了积极错觉策略模型,该模型认为积极错觉是一个灵活富有智慧的加工过程,它可以根据社会文化规则的需要来进行调整。可见,已有研究已经表明,积极错觉具有鲜明的跨文化的差异性。那么文化对于心理的影响是否已经涉及心理机制的不同?另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其积极错觉的表达方式是否会有所不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是否因为文化的原因而选择更为内隐的方式去表达积极错觉呢?然而,目前国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积极错觉的实证研究还很少,未来应该加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4.2 开展对特殊群体的积极错觉的研究

近些年对积极错觉的研究逐渐涉及到特殊群体,如学习障碍儿童、注意力缺陷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等。近些年的研究发现,特殊儿童也存在着不切实际的积极自我夸大。研究发现,有数学学习障碍的儿童在对其数学成绩进行估计时会存在高估的现象,即自我的估计要比他们实际的数学表现要高(Heath, Roberts, & Toste, 2013)。另外,也有研究指出,有注意力缺陷的儿童会大大高估他们在学习任务上的表现,即他们的估计会远高于父母对他们的估计(Chan & Martinussen, 2015),即在学习障碍和注意力缺陷障碍儿童身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学业积极错觉,后续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明特殊儿童学业积极错觉产生的原因以及学业积极错觉与其相关障碍的关系。早期的研究也指出,抑郁症患者与非抑郁症患者相比,其积极错觉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个人控制感程度较低,这也许是抑郁症患者在抑郁状态下所表现出的独有的特征(Taylor & Brown, 1988)。因而比较特殊群体与正常群体在积极错觉上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有可能对探寻某些障碍或疾病的发病机理有启示作用。

4.3 关注对积极错觉的应用研究

近些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对工作领域中积极

错觉的研究。已有研究发现,积极错觉预示着更强的动力、更持久的坚持、更有效率的工作和更大的成功(Anastasia, 2016)。积极错觉也有助于创造性行为的产生,Stankov 和 Lee(2007)的研究指出,积极错觉使个体对自身的能力充满自信,他们可以以选择性记忆的方式来保护自尊,在这种积极情绪的作用下,他们能更容易地想起曾经的成功经历和自我实现的体验,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潜力。此外,积极错觉对于企业的发展创新也至关重要,尽管新的业务领域充满了风险和潜在的失败,但它仍然可以促使人们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Ottesen & Gronhaug, 2005)。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应更多地关注积极错觉的临床价值,将积极错觉与正念、冥想等方法相结合,探索积极错觉的临床应用。已有研究显示,正念减压疗法在应对艾滋病、更年期综合症、肠易激综合征、血压管理及免疫力提高等方面均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王淑霞,郑睿敏,吴久玲,刘兴华,2014),所以,未来的研究要注重积极错觉与相关治疗方法的结合。

4.4 重视对积极错觉的脑机制研究

积极错觉这一乐观的思维方式是物种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对于积极错觉脑机制的研究却没有开展开来,未来的研究要将 ERP、fMRI 等电生理及脑成像技术引入进来,探索不同情境中积极错觉的心理机制与生理机制。

参考文献

- 陈建文,陈莎.(2009).极端应激情境下寻求健康和幸福的新视点——认知适应理论(cat).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8(1),137-140.
- 蒋怀滨,缪晓兰,张斌,王超,邵文飞.(2015).大学生积极幻想对自我和谐的影响——基于应对效能的中介效应.集美大学学报,16(4),17-20.
- 刘利娜.(2010).亲子关系中的积极错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p.31).西南大学.
- 吕丽霞.(2006).心理学新概念——积极错觉.国际中华应用心理学杂志,(4),398-400.
- 牛更枫,范翠英,周宗奎,田媛,连帅磊.(2015).青少年乐观对抑郁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3(4),709-711.
- 王淑霞,郑睿敏,吴久玲,刘兴华.(2014).正念减压疗法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2(5),947-950.
- 张文晋,郭菲,陈祉妍.(2011).压力、乐观和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2(2),225-227.

- 郑美娟. (2017). 大学生积极幻想和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安康学院学报*, 29(2), 99–101.
- Affleck, G., Tennen, H., Croog, S., & Levine, S. (1987). Causal attribution, perceived benefits, and morbidity after a heart attack: An 8-year study. *Journal of Consulting & Clinical Psychology*, 55(1), 29–35.
- Alicke, M. D. (1985). Global self-evaluation as determined by the desir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of trait adjec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49(6), 1621–1630.
- Anastasia, M. L. (2016). Work positive illusion: A cross-culture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moral economies, economic moralities. *Berkeley, CA*, 6.
- Barelds-Dijkstra, P., & Barelds, D. P. (2008). Positive illusions about one's partner's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Body Image*, 5(1), 99–108.
- Barelds, D. P. H., & Dijkstra, P. (2009). Positive illusions about a partner's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6(2), 263–273.
- Barelds, D. P. H., Dijkstra, P., Koudenburg, N., & Swami, V. (2011). An assessment of positive illusions of the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f romantic partners. *Journal of Social &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8(5), 706–719.
- Barelds, D. P. H., & Dijkstra, P. (2011). Positive illusions about a partner's personality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5(1), 37–43.
- Biggane, J. E., Allen, D. G., & Albert, L. S. (2016). The role of positive illusions i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6(3), 270–281.
- Boucher, H. C. (2014). The 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and positive illusions in friendship. *Self & Identity*, 13(4), 460–476.
- Brickman, P., Coates, D., & Janoff-Bulman, R. (1978). 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36(8), 917.
- Brown, J. D., & Taylor, S. E. (1986). Affect and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Evidence for mood-activated self-schemata.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2(5), 436–452.
- Campbell, J. D. (1986). Similarity and uniqueness: The effects of attribute type, relevanc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J Pers Soc Psychol*, 50(2), 281–294.
- Carr, A. (2004).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human strengths (2nd ed.). *Psychologist*, 35(4), 355–356.
- Chan, T., & Martinussen, R. (2015). Positive illusions? the accuracy of academic self-appraisals in adolescents with ADHD.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41(7), 799.
- Dhami, M. K., Mandel, D. R., Loewenstein, G., & Ayton, P. (2006). Prisoners' positive illusions of their post-release success. *Law & Human Behavior*, 30(6), 631–647.
- Heath, N., Roberts, E., & Toste, J. R. (2013). Perception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Positive illusions in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learning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6(5), 402.
- Heine, S. J., & Hamamura, T. (2007). In search of east asian self-enhancement. *Pers Soc Psychol Rev*, 11(1), 24–27.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3).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0(4), 237–251.
- Langer, E. J. (1975). The illusion of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32(2), 311–328.
- Leo, J. (2014). Fantastic and forgiven: Do long-term relationship motives promote positive illusions and forgiveness toward a romantic partner?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37–38.
- Lewicki, P. (1984). Self-schema and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47(6), 1177–1190.
- Makridakis, S., & Moleski, A. (2015).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ositive illus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859.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Self – Concept. The Self: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pp. 47–48). Springer New York.
- Mazur, E., Wolchik, S. A., Virdin, L., Sandler, I. N., & West, S. G. (1999). Cognitive moderators of children's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divorce events: The role of negative cognitive errors and positive illusions. *Child Development*, 70(1), 231–245.
- Murray, S. L., Holmes, J. G., & Griffin, D. W. (1996). The self-fulfilling nature of positive illusion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love is not blind, but presci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1(6), 1155.
- Murray, S. L., Holmes, J. G., & Griffin, D. W. (1996). The benefits of positive illusions: Ide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atisfac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0(1), 79–98.
- Ottesen, G. G., & Gronhaug, K. (2005). Positive illusions and new venture creation: Conceptual issues and an empirical illustration. *Creativity & Innovation Management*, 14(4), 405–412.
- Perloff, L. S., & Fetzer, B. K. (1986). Self-other judgments and perceived vulnerability to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0(3), 502–510.
- Stankov, L., & Lee, J. (2007). Confidence and cognitive test performance. *Ets Research Report*, 1(1), 32.
- Taylor, S. E., & Brown, J. D. (1988). Illusion and well-being:

-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2), 193.
- Taylor, S. E., & Brown, J. D. (1994). Positive illusions and well-being revisited;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1), 21.
- Taylor, S. E., Kemeny, M. E., Reed, G. M., Bower, J. E., & Gruenewald, T. L. (2000).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positive illusions, and health.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99–109.
- Van, V. M., & Nowak, M. A. (2011). Evolution: Selection for positive illusions. *Nature*, 477(7364), 282–300.
- Vevea, J. L. (2005). Pan culture self – enhancement reloaded: a meta – analytic reply to hein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 539 – 551.
- Vincze, A. E. (2011). Positive illu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hilobiblon*, 16(2), 520 – 537.
- Wenger, A., & Fowers, B. J. (2008). Positive illusions in parenting: Every child is above averag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8(3), 611 – 634.
- Young, M. C. (2014). Do positive illusions contribute to human well – being?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7(4), 536 – 552.

Positive Il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volu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Chen Hongyan^{1,2}, Tan Dingliang³

(1.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2. School of Psychology,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3; 3.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Positive illusion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it is essential to maintain individual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sitive il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volu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positive illusion contributes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cognitive ada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 positive illusion helps to maintain good social relationship.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cross – culture research of positive illusion, concentrate more on the special groups' positive illusion,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and cerebral mechanism of positive illusion.

Key words: positive illusion; evolution; social interaction; cross – culture; special groups